

【论 文】

“多民族文学”的阅读与阐释¹

陈平原²

记得是十年前，张菊玲、关纪新两位满族文学专家力邀我出席“多民族文学论坛”，我谢绝了。因为实在太外行，读书少，且一门少数民族语言都不懂，开口必露馅。后来发现是我理解错了，读张菊玲著《清代满族作家文学概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年）、关纪新著《满族小说与中华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尤其是朗樱、扎拉嘎主编《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方才明白所谓“多民族文学论坛”，不一定直接谈用少数民族语言撰写的文学作品（及其译本），或者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从多民族文学如何沟通、对话、借鉴、融合的角度立论，借用朗樱等人著作“前言”的标题，那就是“中国各民族文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格局的形成与发展”。若是这样，我还勉强够能发言。面对诸多专家，实在说不出什么高深的学理，以下所谈九个问题，纯属野叟献曝。

第一，传统中国是怎么看待民族问题的。首先必须明白，晚清以前和晚清以后，中国读书人看待种族及文化的眼光截然不同。1883年王韬出版《弢园文录外编》，其中的《华夷辨》引《春秋》的说法，论证“苟有礼也，夷可进为华；苟无礼也，华则变为夷”。1897年康有为弟子徐勤完成《〈春秋〉中国夷狄辨》，加上梁启超所作序，也都是这个立场。即便提倡革命的章太炎，1907年撰《中华民国解》，也都承认中华民族乃“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成，关键在“文化”而非“血统”，故“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这与唐人皇甫湜《东晋元魏正闰论》的辨析完全一致：“所以为中国者，礼义也；所谓夷狄者，无礼义也。岂系于地哉？”历朝历代的华夷之辨，所争均在文化（礼义）而非种族。这种高度的文化自信，从先秦到晚清，几乎一以贯之。也正因此，才有中华民族日渐融合（也就是章太炎所说的“混杂数千百人种”）的可能性。反过来，若是种族优先，那早就分裂成几十乃至几百国了。文化第一，种族第二，这是传统中国的读书人所坚信不疑的。晚清以前，这个立场被广泛认同，这才有今天以汉族为主体（包含56个民族）、充满自信与活力、日益繁荣昌盛的“中华民族”。即便今天被认定为汉族的，往前推十代、二十代，说不定也是某个少数民族。换句话说，在传统中国语境中，种族的界定相对模糊，远不及“文化”或“礼义”那么理直气壮、坚定不移。

第二，谈论“中国文学”，民族的重要性相对下降，更是一目了然。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古往今来，不管血统上属于哪个民族，只要认同中华文化，采用汉语写作，就早被纳入中国文学史的版图。比如，面对强大的“中华文化”，满族上层人物也倾向于采用汉语来表达思想和感情，如乾隆皇帝写诗，纳兰性德填词等。传统中国，政治是一回事，文学又是一回事。即便在少数民族占主导地位的元代与清代，文学创作仍是以汉字书写为主。所以，我们编写《中国文学史》，很容易从古讲到今，从《诗经》《楚辞》一直讲到《红楼梦》，不会打岔，十分顺畅。可也正因为这个“顺畅”，很容易蒙蔽了我们的眼睛，忽略了历朝历代非汉族作家的生活及写作的特殊性。这正是今天进行“多民族文学”的对话与交流时，必须特别警惕的。

第三，关于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上面说的华夷之辨以及文学一体，乃是基于高度的文化自信。这种自信，面对西洋的坚船利炮，竟轰然倒塌了。在“救亡图存”、创建现代民族国家的过

¹ 本文为作者2015年6月28日在云南民族大学于腾冲举办的“中国多民族文学高层论坛”上的发言，此为修订稿，刊发于《文艺争鸣》2015年第11期。

²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程中，民族主义思潮的崛起是个关键。1902年起，流亡日本的政治家及留学生开始接受并大力传播民族主义理论，使其成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关键论述。这不仅仅是政治主张，还包括了与之配合的新媒介、新语文、新文学。在这个逐步演化的过程中，原本不太自觉的少数民族语文及文学，得到很好的培育与滋养。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民族政策的制定，各主要少数民族均拥有独立的报章、出版、学科乃至院校，加上中央一级的中央民族学院（后改为“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民族文学》杂志等，更是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少少数民族作家或直接采用本民族语文写作，或双语写作，或在汉语书写的作品中凸显本民族的生活情趣与审美特性。这里有政府的号召、民族的自觉、市场的影响等，不能一概而论。而强调民族间的差异性，对作家来说是把双刃剑，在凸显本民族文化立场的同时，也可能使原先富有弹性的民族关系变得过分清晰，乃至有点僵硬了。这里谈的不是意识形态上的对与错，而是由于长期的积累，汉语书写的文学作品拥有更为丰厚的资源，不该因政治立场而刻意疏远。

第四，谈民族问题，必须古今有别。我们曾经因过分强调“政治正确”，生搬硬套，付出了惨痛的教训。比如，用今天的民族政策来衡量古代文学作品，争论《四郎探母》能不能演出，文天祥的《正气歌》要不要表彰，传为岳飞所作的《满江红》是否破坏民族团结等。现实生活中，大家也都记得大剧作家曹禺撰写《王昭君》的教训——不是不能翻案，只是不该让文学创作成为现行政策的注解。作家如此，学者也不例外。谈及古人的思想与文章，借用陈寅恪的说法，“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切忌套用今天的民族政策。近年学界的风气，倾向于全力以赴地挖掘很可能作家本人意识不到或刻意遗忘的少数民族身份，并大加阐释。出版商及评论家更是众口一词，以文学史考定少数民族作家的数量论英雄，如此渲染“创新之处”，我不无疑虑。除非作家有明确表态，或在作品中隐约透露，否则，没必要为每个古代作家确认民族身份。原因是，“中华民族”本就是逐渐形成的，所谓匈奴后裔或鲜卑后裔，若只是血统而无文化认同，不必过于拘泥。不管先辈来自哪个民族，在长期的民族融合过程中，若干代以降，很可能就只会用汉字阅读与书写了。

第五，如何处理专题研究与文学史书写。谈具体作家，怎么考证都没有问题，越详细越好；至于撰写文学史，轻重缓急、大小详略之间，大有讲究。很可能你考了大半天，证据确凿，但无关大局，对文学史书写没有任何影响。这里牵涉价值判断——文学史家考量的，首先是文学成就，而后才是思想立场、民族认同等。陶渊明诗文之所以被我们世代传诵，与其溪族出身基本没有关系。对此话题，专题考辨（如陈寅恪的《魏书司马叡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多多益善，但文学史则只能一笔带过。之所以发此感慨，因近年参加各种文学史、文学读本及大百科全书编写或修订的座谈会，与会者往往纠结于如何发掘汉语写作的少数民族作家，以及怎样将其纳入文学史框架。传统中国文学本是多元一体，流转变迁中，民族身份和文化认同历来比较模糊，且有很大的弹性与空间。着力为两千年中国文学史上无数作家编列档案，确定其种族及文化认同，这工作可以做，但不是文学史研究主要的突破口。我这里说的是采用汉语书写的作家，至于长期生活在少数民族地区且采用母语写作的作家及作品，如何组织力量翻译及评论，确定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那倒是值得认真经营的。

第六，关于文学史的多样性。自1903年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规定新式学堂采用“文学史”，而非传统的“文章流别”，此后百年，文学教授们各显神通，编纂了各种各样的《中国文学史》。何为“中国文学史”讨论的对象？最初的设想很简单，那就是“中国人”用“汉语”撰写的文学作品。如今，这两大标准都受到了严肃的质疑。这里暂时按下“中国人”不表，单说这“汉语书写”。不管是哪个民族，只要采用汉语书写（如元稹、白居易、纳兰性德），早就进入了《中国文学史》，最多只是局部调整；比较麻烦的是中国三大英雄史诗《格萨尔》（藏族）、《江格尔》（蒙古族）、《玛纳斯》（柯尔克孜族），还有维吾尔族古典长诗《福乐智慧》，你怎么在《中国文学史》中呈现其身影？这就牵涉到各有其宗旨及读者的总体文学史、语种文学史、族别文学史、



区域文学史，如何分工合作的问题。那种总揽全局、涵盖古今、强调文学传承、配合国家意识形态，作为高校统编教材的《中国文学史》，我称之为“总体文学史”。此外，坊间还有各种功能各异的文学史。相对于区域性的《湖北文学史》（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5年）、《湖南文学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山西文学史》（北岳文艺出版社，1998年）、《安徽文学史》（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年）等，我更看好以民族或语种划分的文学史，如《藏族文学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年）、《蒙古族文学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年）、《满族文学史》（辽宁大学出版社，2012年）、《中国回族文学通史》（阳光出版社，2015年）等。各区域或各民族文学史的撰写，一般都是追根溯源，从头说起，且承认地理环境、生活习俗、口头歌谣、神话传说等对后世民众的思考、表达和审美起很大作用；但前者讨论的仍以汉语书写为主；后者则扩大到各种少数民族语言书写的作品，对拓展“中国文学”的边界、改变国人的阅读习惯与欣赏趣味，更有意义些。这两类著作，与“总体文学史”之间，构成了一种互补的关系。

第七，关于中国文学发展的动力问题。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胡适、傅斯年、郑振铎等人都曾谈及，两千年中国文学并非永远向上，一帆风顺，而是跌宕起伏，回环往复。当中国文学呈现整体性的颓败时，有两种途径使其重新焕发青春：第一是从民间吸取养分，第二是从域外获得榜样。这两大“强心剂”，是中国文学不断自我更生的关键。也就是说，或眼睛向下，到民间去寻找文学发展的动力；或眼睛向外，借异域文化的传入重获新生。今天看来，有必要引入第三种发展的动力，那就是中国境内多民族文学的对话与互动。考虑到人类文明史上的“中国文学”大厦，确实是以汉族及其书写形式为主体，那么，我们有必要证明不同时期各少数民族文学如何为这座大厦添砖加瓦，乃至局部更换，使其得以抵抗时间的侵蚀，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回头看，这半个多世纪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让我们对中国文学的自我更新有了更为清晰的理解。引入这“第三种动力”，视野发生了很大变化，会浮现若干陌生的名字，但不会威胁到太多经典作家的历史地位。屈原、陶潜、李白、杜甫照样很重要，只是论述方式需要做些调整。其实，“多民族文学”视野的形成，主要意义在于打破传统的独尊汉族文化的思维定式。当然，凡事皆有度，不能矫枉过正，免得因照顾民族比例而将“中国文学史”弄得支离破碎。须知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生产、流通、阅读、传播缺一不可。假定一部作品，历史上从不被重视，也没能进入一代代读书人的视野，千年后突然出土，当作“考古成就”可以，捧为“文学经典”则不妥。如此“经典化”的过程，不取决于个别人的意志，而是中华民族历史意识与审美趣味的积淀。在这个意义上，引入多民族文学的对话，对总体文学史的书写会有影响，但不会是颠覆性的。

第八，关于“文学关系”的把握。重写文学史时，应更多地关注多民族文学之间的交流、对话与相互影响，我认为是日后的发展方向。但这里有个难题，与“中国文学主流”发生关系的，不管是接纳、转写，还是对抗、背叛，都容易纳入论述；而那些因远离中原政权或汉族文化、独立存在千数百年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或艺术形式，则很容易被忽略或排斥。说明白点，就是如何尊重少数民族文学的独立性，而不要过分强调“中国文学”的整体性。“中华民族大团结”是今天的口号，历史上各地域各民族的文化及文学差异必须被尊重。为了政治正确或逻辑严密而强力“收编”，无论说高还是说低，效果都不好。保持主干不动，允许“节外生枝”，如此五彩缤纷的局面，方才是中国文学的真实状态。在我看来，刻意压抑“主流”之外的声音固然不好，强行招安，也是一种扭曲。更通达的做法是，承认文化及文学的多元性，在适当的地方“立此存照”，这样就可以了。

第九，确立“多民族文学”的视野，对于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意义。在我看来，谈论少数民族文学及文化，并非只是国家民委的责任，教育主管部门也应该积极介入。民族融合是双向的，让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了解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这很重要；反过来，也得要求汉族地区的学生了解曾经很辉煌、至今仍在少数民族地区被广泛阅读与传唱的文学作品。而今天的实际状态是，谈论少数民族文学，不管创作还是研究，都只局限在小圈子里，没能进入更为广阔的公共视野。或

许有必要编译一册少数民族文学读本，并在大学里开设相关的必修课或选修课。这么做，比简单的宣讲民族政策更有效果。我当然明白，此事牵涉面很广，需要政府的允许与支持，不是学者单凭热情就能做好的。但我坚信，编一册这样的读本，让其进入大学校园，促使汉族学生更多地了解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及文学（及其蕴含的历史传统、宗教意识、生活习俗等），养成开阔的视野、宽广的心胸、多元的趣味，不仅有利于消除各民族间的隔阂、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更可促成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健康成长。

【论 文】

双重认同的整合： 多民族国家认同建构的政策评析¹

胡兆义²

摘要：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是人们最为重要的两种群体认同，二者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如何实现二者的整合直接关系到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在多民族国家中，各国政府运用多种理论来指导本国国家认同的建构，形成了几种较为典型的模式。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分析和借鉴其他国家处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的理论与实践，总结其中的经验与教训，对于实现中国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和谐共生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整合；和谐共生

一、引言

认同是当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热点之一。生活于社会之中的人扮演着多种角色，处于不同的社会关系之中，并因此获得了多重的认同形式。随着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各民族之间、各地区之间、各国家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人们也在这快速变动的世界中更加渴望集体的安全感。在寻求集体归属的过程中，民族和国家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就成为人们认同体系中两种最为重要的群体认同形式。在当今世界，特别是 20 世纪后半期，最令人困惑的一个趋势就是：政府正在不断地被由其社会结构下的少数民族产生的族群民族主义所烦扰、哄骗与挑战。^[3] 在多民族国家中，由于各种原因，各民族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是不均衡的，这就使得很多地方的社会冲突多少带有民族矛盾的背景。因此，为了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稳定，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研究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政府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为实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整合，各国政府在不同的理论指导和实践基础上，形成了几种典型的模式。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分析和借鉴其他国家处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的理论与实践，总结其中的经验与教训，对于改善中国的民族关系、实现中国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和谐共生，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¹ 本文刊载于《广西民族研究》2015 年第 5 期，第 19-26 页。

² 作者为湖北民族学院法学院讲师，博士。

^[3] Frederick L. Shiels, *Ethnic Separatism and World Politics*, Marylan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4.

